



紅軍

——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 主 编：《红军》 编委会

红

军

《红军》编委会

(第四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二十八、长征路上“袁破坏”——袁林

简介：1913年生于井冈山下的永新县南乡长富乡袁家村。1928年参加少先队，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作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长征开始后在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工作，历任破坏干事、破坏科长。抗日战争中，在红军第二十七军政治部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部长，后任团政委、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营教导员，新四军营教导员、团政委。1959年奉命组建井冈山管理局机构，先后接待了朱德、毛泽东重返井冈山。



从南昌出发时，听说有一位曾接待过毛泽东和朱德的长征老红军袁林，记者就一直在多方寻找他的下落。没想到，在吉安市无意中打听到了他的下落——原来，老人现在住在吉安的他儿子家里。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吉安市干休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顺利地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找到了袁林。

袁林的耳朵背得很厉害，一口永新话也非常难懂，但是当他听懂我们是为纪念长征开始70周年而来寻访健在的老红军后，显得非常激动，在他妻子的耐心帮助下，我们的采访艰难地展开了。

弹雨中，袁林跑到一条最高的田坎上，吹起冲锋号……三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倒在稻田里。

1930年4月，还差半年才满17岁的袁林参加了红军，在红二十军当战士。营里缺少号兵，就选了袁林等三个年纪小的战士学习吹号。

“那阵儿，做梦都想拿枪上战场，一听说当卫生兵、炊事兵，满肚子不高兴。”直到今天，袁林还记得最初成为号兵时那种不满。

惟一令袁林欣慰的是，营长给他弄了顶军帽，军帽上的红五星是红布剪裁而成的——那是惟一能体现他是红军的标志。

第一次战斗，袁林不仅没能吹响军号，还犯了个错误。

一开战，暴雨般的子弹呼啸着，打在他前后左右的稻田里，直冒水泡。袁林觉得每一颗子弹都是冲自己而来的。三小时以后，红军战士冲到山顶铁丝网前，敌人蜂拥而出，双方展开肉搏战。红军战士敌众我寡全部阵亡。

战争如此惨烈，袁林看呆了，不仅没吹军号，甚至没有听到撤退的命令。结果受到了司号长的严厉批评。

在水口激战中，站在连指挥所的袁林，亲眼看到自己朝夕与共的号兵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枪下。

袁老回忆说，当时，全团只剩下不到二百人。后来当了开国上将的师政委朱良才把他们整编成一个连，由师参谋长耿飏代理团长。

朱良才问：“你们团还有几个号兵？”

“就我一个。”袁林说。

“不能让敌人停歇，吹冲锋号，攻占对方的山头！”朱良才命令。

弹雨中，袁林跑到一条最高的田坎上，吹起冲锋号……

三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倒在稻田里……听到冲锋号声，那些受伤和疲劳地倒在地上的红军士兵们又呐喊起来，拄着枪、刀，冒着敌人机枪扫射，冲向山头，与反冲锋的敌人短兵相接，



展开血肉拼刺……红军寡不敌众，撤向友邻部队的阵地。

醒过来的袁林，和另一位战友扶架着一名伤员落在后面，一群敌人紧追过来。袁林让战友背伤员先走，自己伏在田埂上，举起驳壳枪把跑在最前面的三个敌人撂倒，紧接着向左边最近的一个小山奔去，引开了敌人……

1931年，第四次反“围剿”前夕，袁林到军团政治教导队学习，从此离开了号兵岗位。但是，他保留下了自己的号嘴和号兵符号牌，符号牌是红色椭圆形的，上面写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一连司号员袁林

“没想到，我这个号兵的经历，在长征路上还发挥了一次作用。”袁林特别告诉记者，在董公寺战斗中，战况至为惨烈，以至于一位名叫贺友寿的老号兵竟紧张得吹不响军号，身为破坏干事的他来不及查问号兵是谁，接过军号就吹。

袁林说，战斗中，军号就是命令，没有了军号，战士们就会不知所措。所以，作为号兵，决不能耽搁一分一秒。

“号兵要有娴熟的技巧，更重要的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战场上精神过于紧张，一个音符吹错了，或者是吹不响号，都很可能给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

因为作战勇敢，袁林被指派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是六百多位代表之一，“毛主席”称号就始自这一次大会。

1931年10月底的一天早晨，连长笑吟吟地找到袁林。

“大喜讯：下个月初，在瑞金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团部指定我们连派出20名战士代表全团参加大会。我和指导员认为你作战勇敢，让你去参加大会。”

袁林不由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裤子，淡灰色的裤子已经洗白，两条裤腿



上有几个破洞。

连长看出了他的难堪，拿出了自己珍藏在枕头下的那条马裤。裤子太大了，指导员把两只裤管向内卷翻两寸，用针线缝了起来。

袁林说，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1月7日下午在叶坪的谢氏宗祠召开的——直至今日，那座始建于明代的建筑还完好地保存着，里面的陈设仍按当年“一苏大会”时的样子摆放。主席台上，绣有镰刀铁锤的红旗至今鲜艳夺目，两侧的对联分别写着：“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上方悬挂的条幅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这座“人民大会堂”里，袁林等来自全国七个苏区的600多位代表，代表所辖范围16万平方公里的1000余万群众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利，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经刚刚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向世界宣称，这个国家的政权属于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

袁林告诉记者，选择11月7日这一天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生日，是因为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蒋介石30万人马，被朱、毛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已形成包括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250万人口的辽阔地域。

这是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东方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世界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

入夜，红军广场一片欢腾。瑞金城和叶坪村同时举行提灯晚会，庆祝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的诞生。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组织全县军民提着各式灯笼，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拥向叶坪村。袁林回忆说，提着150多盏马灯的锣鼓唢呐队不停地吹打喜庆的乐曲，整个会场一下沸腾起来；妇女秧歌队的队员都穿着新衣服，手拿扇子灯，边歌边舞；每个乡都有四五百人的祝贺队伍，每进来一支队伍代表们就和大家一起鼓掌，呼口号，时间长了，大家的巴掌都拍痛了……



“毛主席”这一称呼，最早就出现在这一时期。袁林说，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7天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还被选举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第一次走上管理全国政务的岗位，“毛主席”这一称呼也由此叫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正是从瑞金开始其治理国家的生涯的。在袁老的一份资料中，记者看到，在由63人当选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4午后他们被一同选为党的“七大”五大书记，18年后的10月1日，他们又一同在开国大典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被任命的军委委员有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24午后，他们一起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次伟大的预演，袁老认为。

长征中，他被称为“袁破坏”。袁林说，做破坏工作，光说不行，身手得好。在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时，自己就被评为特等射手，获过奖。

长征途中，袁林曾长期担任“破坏干事”一职，被战友们戏称为“袁破坏”。

袁老解释说，破坏，其实就是瓦解敌军工作。在红军总部中，总政治部是个大单位，除军事部门外，宣传部、破坏部、民运部和后勤等部门都是它的下属单位。

袁老说，当时，邓小平就在宣传部工作，负责编辑出版《红星报》。他烟瘾很大，用纸卷着生烟丝一支接一支地抽，没烟丝了就向贾拓夫和总政治部秘书长肖向荣他们要。他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受到打击被撤职后，一直没有得到重用，行军没有马骑，宿营与大家住在一起。

“兵运工作做得好，威力非常大，比飞机大炮还厉害。1931年，国民党派第二十六军来‘围剿’我们，我们派人到该军去做策反工作，参谋长赵

红军

博生率领全军起义，一下子近两万人倒戈过来。”袁林告诉记者，这支部队，就是后来的五军团，长征路上曾长期担任红军的后卫，立下了赫赫战功。

袁林回忆说，当破坏干事，经常要冒险在阵前喊话。有一次，在攻城战斗中，他利用废墟作掩体采用游击式喊话，东边喊几句又迅速跑到西边叫几声，一会儿在街中心叫，一会儿又在街尾喊，气得城墙上的敌人嗷嗷直叫，胡乱地用步枪、机枪扫射。

这时，敌机来了，城墙左角的一个军官指指红军阵地，对天空力竭声嘶地吼叫：“朝共军投弹，向山那边投弹！”

袁林大声喊：“你们的飞机听不见你的叫喊，也不敢乱投弹。白军士兵们，你们被包围了好几天，只要你们投降，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赶快打死长官，投降红军！”

那个军官破口大骂：“你们是共匪，土匪，共产共妻，杀人放火！”

袁林从战士手里拿过步枪射击，那个军官应声而倒，其他的敌人吓得大声叫着向四处逃窜。

袁林说，做破坏工作，光说不行，身手得好。在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时，自己就被评为特等射手，获过奖。

后来，在西征和东征中，袁林一直作为破坏干部随军行军，曾单枪匹马进入敌人守卫的城中，也曾冒险与敌人阵前换信，在瓦解敌军方面做出了不少成就。

重伤员集中在民房里，他们没有呻吟叫喊，而是忧愁满脸。一位伤了腿的伤员对袁林说，“我双手还在，还能开枪……”

在长征中，袁林并不总是破坏干事。

老鸦山战斗，十团重伤员比较多，必须在部队转移之前妥当安置，杨勇主任把这次任务交给袁林。



“当时，部队规定，团以上的伤病员不能行走，可以坐担架随部队行动；营以下的伤病员不能行走，一律寄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治病。”袁林回忆说。

重伤员集中在民房里，他们没有呻吟叫喊，而是忧愁满脸。一位伤了腿的伤员对袁林说，“我双手还在，还能开枪……”

还有一位张干事，托袁林带一封信给杨勇。

这封信很短，不仅字迹潦草，而且有好几处有泪水溅落的痕迹。在信中，陈述在反“围剿”中因救护红军伤员全家大小遭敌人杀害的悲惨遭遇，以及他在红军中感受到的刻骨铭心的真挚情意和温暖，表示如不能跟随部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他死不瞑目！

含着泪看完信，杨勇，这位后来的开国上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让他跟着部队走吧。我有一副担架，请老百姓抬着他走。”

当时，杨勇本人的腿伤还没有痊愈……

袁林回忆说，这位张干事非常顽强，在日后的行军中，他只坐了三天担架，咬着牙拄着拐棍行走，上山下坡时大家搀扶着他，道路稍平坦，他就拒绝搀扶。

4月底，红三军团由思力坝向马鹿塘推进时，袁林受命带领宣传员王屏和卫生员尾随部队行军，沿途收容伤病员和其他掉队人员。

“第一天，我们收容了六个伤病员。”袁林说，其中一位胸部中弹的重伤员，在路边的一个小村子里一打听，已经寄留了兄弟部队的四五个重伤员，考虑到伤病员寄留不宜集中，只好请两个村民用木靠椅抬着他走。

袁林说，当时，贵州、云南、四川这些地区的老百姓大多数有抽鸦片的嗜好，在他们眼中鸦片烟的价值远胜过银元。“请抬担架的民夫时，我对村里的人说用银元请他们抬人，他们各个都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有两个人哈欠连连地问我有没有鸦片烟，我说：有。这两个人立刻来了精神，过足了烟瘾之后，三下两下地扎绑好木靠椅出来抬人，精神抖擞地大步流星

赶路。

第四天，伤病员已增加到 24 人。

收容工作人员只有三个，照顾不过来。轻伤员就给重伤员擦洗伤口、洗脚洗脸、盛水盛饭。

很快，粮食就吃光了，药品也没了。云南的天气很热，几个重伤员的伤口开始发炎化脓了。银元鸦片也所剩无几，无法请人和购买粮食了。

袁林决定把六个重伤员寄留在老百姓家里。

“那是一个非常伤感的时刻。”几十年后，回忆起那个时刻，袁老仍会怔怔地陷入思念之中。他说，伤员们都很自觉，但是，这加倍地使他感到痛苦——就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自己都没有那样地痛苦过。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活下来。”老人说，“这将是我一辈子难以放下的心事。”

中原突围九死一生：当时，党字有简体和繁体两种写法，“我们用简体，国民党用的是繁体。我们要是一写，他们马上就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了。”在井冈山管理局时，迎接毛泽东、朱德重上井冈山。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袁林在新四军鄂东军区豫南军分区第九团当团政委。在中原突围后，由王树声率领的二纵二旅决定，由他带着 5 名团以上干部，各带一支短枪，组织突围。冲出大山后，他叫大家把枪破坏掉，然后分散行动。

无数番惊险的潜藏和逃亡后，袁林和另一名同志来到宜昌附近，被国民党乡公所抓住了。他们冒充说自己是国民党逃兵。“他们不相信，问我是什么兵，我说是号兵，他们就拿号来，我以前当过号兵，也会吹国民党的军号，就吹给他们听。他们还故意写了‘党’来考我们。”袁林说，当时，党字有简体和繁体两种写法，“我们用简体，国民党用的是繁体。我们要是一写，他们马上就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了。”



靠着这份机敏，袁林和战友在被扣押一夜后，逃脱了。由于国民党查得非常紧，他只好一直向南走，一路要着饭，朝自己的故乡——井冈山前进。

回到江西永新后，袁林一直想办法筹措经费，准备返回部队，有一次甚至走到了郑州，结果出了意外，又返回了家里。之后，就和当地地下党联系，解放军解放永新时，他当了向导。

1959年到1966年间，袁林先后任井冈山管理局局长、书记。负责接待了毛泽东和朱德返回井冈山。

老人停止了采访，让老伴为我们放井冈山管理局送他的朱德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光盘。

“毛主席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说的就是那一次。”老人骄傲地说。

【记者手记】

最难忘红军生涯。九旬老翁写自传

采访中，袁老说，每当回忆起长征时期的峥嵘岁月，自己总是心潮涌动，想把它如实记述下来。

从1985年开始，老人就开始整理自己的经历。2001年，袁林再次开始完善自己的回忆。此时，老人年事已高，听觉不灵、视力衰减，还坚持每日花费2—5个小时，口述自己的革命经历，再由家人、朋友记载下来。

“基本每天能完成500—1000字的创作。”据袁老之子袁永明说，回忆中，老人有时涕泪横流，为牺牲的战友悲伤难抑；有时兴奋异常，为当日战役的胜利手舞足蹈。为了老人情绪稳定和身体健康考虑，家人有时不得不强制老人中断写作。

2004年1月，凝聚老人心血的《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创作终告完成。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91岁的袁老希望：在红军长征70周年之际，能将

★ ★ 红军

凝聚自己毕生心血的《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成功出版，以此纪念自己走过的那一段难忘的激情岁月。

老人说，以后，自己还将继续努力，写出自己在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传奇经历。

二十九、五一的前后——莫文骅

—

正是四月，转战万里的红色干部团（即红军大学及步兵学校合编的）的长征英雄们，在酷热的干燥的太阳曝晒之下，背着枪弹、包裹、粮食，向北迈进着。汗珠儿滴滴地流出，衣服湿透了，钢帽发热了，有些赤足的脚步也发红了来，张着口，喘着气，他们在艰苦的行军！

很疲倦的时候，遇着零星树木，便休息一下，拭一把汗，喝两口冷水，精神又恢复了，继续的走，且引吭高歌“炮火连天响……”

4月29日的那天，干部团前进至离天险的金沙江（属长江上游，是四川与云南交界处）二百八十里的彝民地区，接到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着干部团“五一”夺取金沙江！

这是与整个北进战略方针的完成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因为只靠这一渡口渡河，其他渡口均被敌人占领了；敌人扼守对岸，而且烧毁了船只；这一渡口的敌情又不很清楚；在那时敌人以十多万兵分三路向我们追逼，如果夺不到这一渡口，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将不知有几多的艰难险阻呢！

接到这一命令，谁个也知道是危险艰难的任务，但是大家都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已经克服了许多的困难，这虽然是艰难危险的任务，一定可以完成的。我们可以战胜天然的和人为的一切障碍。

未明的30日早上，稀少的晨星还在闪烁，在黑暗的天际，慢慢地能看出一条淡黄色的曲折的原始道路。那时，前卫连——政治营第八连的同志吃饱了饭，勇敢而活泼地向北前进，去担负伟大而光荣的任务了。

红军

政治八连，均是青年的政治干部，亦即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

行行，天明了，再行，天热了，又行，啊！炎酷的天气迫人太厉害哟！可是那一群英勇的大有希望的政治干部，虽然有些才十六岁，他们依靠着政治上最坚定的意志和万里长征中锻炼过的两条腿，克服了沿途的一切困难，整天走了一百里！

连日行军已觉辛苦，而今又赶路，的确疲劳了，脚也酸痛了！那被汗所沾污了的衣服有些酸臭的气味。

“明天还有一百八十里呀！”他们的连长这样说，并叫大家快些休息。于是大家赶忙的用热水洗脚，喝开水，吃了饭，都休息了。

正在睡得很舒服的半夜，他们被起床号吹醒了，急忙忙地吃了饭，整理武装又出发。

我们要夺取金沙江纪念“夺取金沙江北上抗日！”这是半夜出发时的政治鼓动口号。那一群英勇的只知为党的路线奋斗而不顾自己生命的青年政治干部们，齐声高呼誓死夺取金沙江；并唱着红军胜利歌，为自己的胜利前途预祝。

战斗姿势的一百八十里的暑天急行军，行——休息——爬山——下岭，大家互相鼓励着前进，直走到天色将黑，听彝民说，只有五十里了，这给了大家以很大的鼓励。因为已走了一百三十里了呢！再走，天慢慢黑了。又过了五个钟头，天已二更时分，从一个高山陡直的下去，那是在广漠黑暗的太空里，除了半明不灭的淡月和初起的稀疏的几颗微星外，一切都是黑暗死寂的！人们的脚步，也轻轻的走着，生怕惊动了寂静之神似的。一会儿，不远的前面，随着微风慢慢地送来“沙……沙”的声响，突然打破了战士们在黑夜时行军的寂寥！“听！——细听呀！这是河里浪涛的声音！难道这就是金沙江畔不成？”一个小同志惊讶地注意地一面走一面说。

前进哟！大家同意小同志的判断，而抖擞精神地前进！因为河水的声音，是万里长征中他们的经验所易于判断出来了的。现在，一百八十里的



长途，被他们坚忍不拔的毅力所征服了。

的确金沙江已映入他们的眼帘，急流的水，滚滚的波涛，汹涌澎湃地宛如万马奔腾。真是：“浩浩长江水，莽莽向东流”啊！在黑夜里，只见月影在波涛里抛去抛来，河中景色看不分明了。

突然间，迎面来了几个人，有一个携着一只灯笼。“大约是敌人的巡查吧？”他们这样想。因为想得到情况的缘故，要捉活的，于是迅速的将一班队伍散开埋伏，其余队伍停止。近了，近了，正要动手，再一看，啊！原来是熟人！——是派在前头的便衣侦察呀！

侦探告知了敌情与渡河点，于是迅速秘密的接近江边。那里正横着两只小艇，他们当时好似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喜欢到了极点，差不多要大笑起来，但是又忍住了。

渡河，两只艇可以容三十人，于是一排人先渡过去，撑艇的是我们先预备了的好手。轻巧玲珑的小艇，在那约三百米宽的急流中，飘忽的过去了。在浪涛中，有些被水花溅湿了衣服，有些头晕了，然而一到岸也就好

黑沉沉的夜半，不知道船靠岸的地方，只管靠岸就算了。一上岸走了几步，忽发现一个黑影在几米远的前面，见着向后便跑。战士们跟着便追，不到十米远，到房子外，那个黑影将房门乱打，急急的叫着“开门！”什么原因是说不出的。追到了，一把捉住，原来是一个守河岸的哨兵！那时里面的听到打门，很不高兴的骂：“见鬼么？半晚来打门！”说着便不应。即时又听到另几个人的声音：“白板”，“二索”……从一线的灯光射出的门隙中，看出是打麻将的，同时阿芙蓉戈的气味随着微风袅袅地浮出，触鼻生香。战士们开始拍门了：

——开门哟，先生！

——干什么？

——过路的。

——过什么路？明天再来。

——我们过路来纳税的。

——纳税么？好！好！

里面听到“纳税”二字，急忙的有一个人出来开门。因为这里是厘金局，红色战士们到门口时，便在黑暗里模糊地看见了招牌，所以叫纳税。厘金局的人抱着满腔的希望，以为又可以抓一手钱了，可是事情往往是难想像的，超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才开门就被捉了。

继续的一、二、三、四、五……捉了这个房，又捉那个房，赌牌的、抽大烟的、睡眠的都捉他妈的一个精光，共六十多人。内中有三十多武装兵，没有打枪便被捉了，真正饭桶！

厘金局剥削来的税款共五千元，亦被没收为抗日基金了。

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人，也不掉一个队——当然脚是走痛了——垂手夺取了天险的金沙江，开辟了北上抗日的前进道路，创造了战争史上光荣的一页！胜利的纪念了红“五一”艰难危险的任务，就此宣告完成！

写到这里，我怀想到抢渡金沙江的领导者中的霍海源、林芳英二同志，他们到陕北时均任团长，后在残酷的战争中牺牲了！

霍、林两同志的英名，和金沙江战争的光荣历史永远并存于世！

二

“真是危险得很！”

捉得许多俘虏之后，从俘虏口供里知道，明天便有一营兵前来扼守，并着令赶快破坏船只，断绝交通，因为知道“共匪”可能渡河的。于是有些同志听了便叫起来，如果真的来了一营兵，破坏了船只，真是仙人也难渡过那惊涛怒浪的金沙江！

干部团的主力陆续赶到了，急忙忙的连夜渡河，但随你如何的急，一次才能渡三十人。船过去的时间不到十分钟，转回非半点钟不可。

又是一个大问题了：河水之急，河面之宽，没法可以架桥；那两只小



艇爬来爬去，整天和一夜只能渡一千三百二十人，那么，渡整个方面军，则非一个月不可了，这还了得！于是分头派小部队弄船只，结果，弄来了六只船，经过我们的宣传、鼓动，许多同情红军的撑船工人，纷纷的替红军撑船，这又是一件成功的事。

啊！扯远了，回转头来，说到当晚的情景。因疲劳极了，除了必要的警戒外，都在沙滩露营。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转头回顾，万山重叠，高插云霄，峭壁悬崖，令人惊心动魄！树木稀少，零星的枯草，点缀着光山。那齐天大圣的子子孙孙（猴子）在石壁中攀去攀来，忽而对人们看，忽而害怕似的躲进石崖里去了。红日初出，映射在沙滩上，一片光沙，闪着黄金的颜色，金沙江之所以出名，大概就是这样来的。

一群战士在河边洗脸，因为河水清凉，大家吃他几口，全身凉爽，不是“饮马长江”，而是饮入长江啊！

无线电转来命令，干部团又要履行新的任务了，即刻出发向北进，占领离河岸二十里的通安。这是一个重要的据点。于是留一个连维持渡河秩序，其余出发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进四川的第一天，不得不使我们回忆起古人的诗句。瞧！闪电形的石山路，只可容一人，曲折盘旋，崎岖险恶。为了抢登山顶，以免被敌人先机占领，所以抖擞精神的向上爬。

上了两点多钟，快到山顶了，路更为险要。

“啪！……啪！”山顶的隘口向我们的前卫连打枪了，这真糟糕！然而我军不顾一切的，把每人之间的间隔距离拉远一些，继续前进，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前进消灭敌人才有生路，退后便是死路。

“哗啦！……哗啦！”山上的石头，从队伍的中间滚下来了，滚时是大块的，越滚越破，结果成炸弹一样，四面飞下来，好不厉害！中了，打中了我们好几个同志，有的中脚——走不得了；有的中头——破了；有的中身——肿了！有的……那时前面打枪，中间滚石头，前卫连表现着踟蹰，